

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

林明德

——九一八事變的探討——

一、前言

九一八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的開端，就近代中日關係史而言，實為劃時代的轉捩點。要瞭解此一事變的前因後果，闡釋其歷史意義，必須從多方面加以深入的探討。偽滿洲國的建立，實已顯示其已超過單純的外交交涉，國際糾紛的領域，而成爲中日兩國錯綜複雜的問題。

依據丸山眞男的界定，所謂「軍國主義」，「乃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羣體，爲了戰爭或策劃戰爭所採取的措施或制度，占有絕對性的地位，使經濟、政治、教育與文化等國民生活的領域，從屬於軍事價值的思想及行動模式（註一）。」此處不用帝國主義，而強調軍國主義，主要原因乃著重此一時期日本武力侵略的層面，蓋日本對華侵略政策——大陸政策的形態，已由政治、經濟的侵略轉化爲以國防優先，軍事爲主的擴張。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以及此後日本的政策，正是此一軍國主義模式形成的開端。因此，本文擬由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內外在的背景，探求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及侵略東北的原因，並闡析日本軍國主義所建立偽滿洲國的政治形態，及其外交方針改變的過程。

二、日本軍國主義形成之內外在背景——九一八事變原因分析

九一八事變究由何而起？何以日本於此時發動武力侵滿行動，並製造偽滿洲國？史家對此雖已有分析，但並不充分，如

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一書，對此述之甚詳，且羅列了幾項「偽因」，並舉出三項「真因」：(一)太平洋軍事形勢之暗換，(二)中蘇關係之起落，(三)滿蒙分離運動之絕望（註二）。其實，前兩項應屬國際之背景，而後一項則僅為日本大陸政策過程中之一環，析論範圍過狹，且欠深入，足見其未能作全盤的考量。蘇振申則以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的思想背景來透視事件的原因，雖較深入，却不能廣泛的探討問題的核心（註三）。事實上，引起此一事件的原因很多，必須由日本國內問題——政治、外交、經濟、戰略以及軍事思想等——與中國的境況、反應、國際環境等方面加以闡明，始能瞭解其真相。以下擬就日本侵略滿洲，形成軍國主義的內外因素加以分析。

I 日本國內的內在因素

(1) 日本大陸政策推展之動因

日本自德川幕府末年（十九世紀初）以來，即盛行向外擴張的殖民思想（註四），及至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逐漸發達，在其全盤西化過程中，竟也同時吸收列強爭霸海外殖民地的侵略主義。一八九〇年發布的「教育勅語」，與稍早頒布的「軍人勅語」，無異以法令形式強制每一個國民接受絕對專制的神皇制國家觀，即以軍人教育和初級教育為基礎，迫使全國國民接受軍國主義教育。

一八九〇年，日本軍閥鼻祖山縣有朋提出維護「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主張（註五），旋又進一步主張日本於將來獨步東亞，建立世界強權時，勢須與美俄決一死戰，因而必須經營滿蒙，始能彌補日本資源與土地之不足（註六），此一論調為後來石原莞爾等人所承繼。

侵略滿蒙，進而兼併整個亞洲大陸，實為日本大陸政策的目標，所謂大陸政策，實為日本向外擴張政策中的北進政策（註七）。大陸政策經兩次對外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而大為擴展，至九一八事變達到高峯，在偷襲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大抵是以北進的大陸政策為主。

日本原為中國四隣小邦之一，其幅員與人口均不足與中國相比擬，但其大陸政策形成之動因，則為明治維新前後，日本民族所表現的特性——「國體」觀（註八）與「大和魂」之優越感，以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對原料、市場與經濟之需求

等因素。尤其在戰勝俄國（一九〇五年）以後，油然而生「大國意識」，同時舉國上下宣傳「滿洲」對日本的重要性。日本人以為南滿的權益乃是耗費了十億國幣，流了二十萬人的血所換來的代價，因此，「勿失滿洲」的口號甚囂塵上，甚至杜撰所謂「滿洲聖地傳說」，煽惑對外危機意識，作為進窺我東北的藉口（註九）。

一九〇九年四月山縣有朋草擬了一篇「第二對清政策」，強調在滿洲建立日本勢力之重要，並主張於必要時不惜訴諸武力（一〇）。

日俄戰爭以後，因國際局勢之轉變，日美關係日疏，原為敵對的日俄關係却反而更為密切，自一九〇七年以後十年間，日俄先後訂立四次密約，共同劃分南北滿勢力範圍（註一一）。辛亥革命後，日本亦曾多次在東北策動「滿蒙獨立運動」，均歸失敗（註一二），但染指東北的野心則未嘗稍戢。

(2) 事變前日本對華積極政策之由來

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春，日本對華政策大體上是依循「協調外交」原則，採取着重擴張經濟利權的「守勢」外交，此一時期稱之為「幣原外交」。其間，日本對中國的排日運動，通商條約的改訂，治外法權的廢除等，大都採取消極態度（註一三）。

外相幣原喜重郎雖一再表示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對於日本在華之「正當且重大的權益」，則表示不容受到威脅，尤其認定其在滿洲之利權，與日本國家的生存有密切的關係（註一四）。易言之，幣原外交，雖暫時對中國採取較為消極的態度，但仍視滿洲為其禁臠，力圖將東北自中國剔除在外，蓋對滿洲的擴張乃是日本傳統的計劃與目標。

其實，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結果，雖多少壓抑了日本的野心，但日本在滿洲的勢力並不因之而衰退（註一五）。

外相幣原既特別重視滿蒙的重要性，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清浦內閣所制訂的「對支政策綱領」，已確定「向北滿開拓的方針」，並強調為了「維持滿蒙的秩序，……於必要時採取機宜的措施（註一六）」。

此時日本軍部（註一七）的態度尤為積極，在一九二四年九月至十月間的第二大直奉戰爭，以及翌年（一九二五）年底

的郭松齡倒戈事件時，日本軍部無不直接間接援助張作霖，實行干涉（註一八）。後來，駐華大使館武官林彌三吉主張日本應向西伯利亞發展（註一九），陸相宇垣一成亦明確的表示日本不能放棄滿蒙（註二〇），關東軍司令本庄繁更垂涎滿蒙的資源，力主確保滿蒙（註二一）。

幣原謂「不干涉內政與擁護權益方針」並不抵觸（註二二），但實際上日本的權益本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結果所獲得的，亦即侵犯中國的主權所造成，或壓抑中國的抵抗始得維繫。因此，要維護日本的權益，必無法貫徹其不干涉內政的方針。幣原外交雖表面上看似較為和平，但在處理二次直奉戰爭、五卅事件、郭松齡事件等時，爲了維護其權益，仍依恃軍事力，因而無法避免「双重外交」所產生的矛盾「結構」（二三）。難怪有指幣原外交與田中外交「只有形式上之改變，而無實質上之變更者」（註二四）。

即使是如此，軍部與資本家階層却仍不滿幣原外交之「消極」，不甘心於「二元外交」，指斥幣原外交的軟弱，尤恐中國國民革命勢力波及滿洲而影響其權益（註二五）。一九二七年一月，「日華實業協會」等工商界團體，發表共同聲明，要求日本政府保護在華日人的生命財產，輿論亦大力鼓吹對華強硬政策（註二六）。樞密院遂借題抨擊幣原外交，彈劾日本政府的「袖手旁觀」、「不抵抗主義」。幣原遭受各方的壓力，終於去職，改由主張積極自主外交的田中義一取代（註二七）。

田中內閣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成立，外相一職由田中自兼，外次則由一個極端國粹主義者，即積極開擴滿蒙論者森恪擔任。標榜刷新對華外交的田中內閣，由於龔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聲明遵守各國條約上的權利，並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初無實行積極政策之理由，但在軍部與輿論各方面的鼓勵下，終於迎合對華強硬的潮流，而於國民革命軍推進至濟南時，決定出兵阻撓（註二八），旋又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滿蒙的積極政策（註二九）。翌年又先後二次出兵，且挑起五三濟南慘案（註三〇）。

喧騰一時，迄仍引起各方爭論的「田中奏摺」乃是「東方會議」的產物，為日本大陸政策的集大成，始終成爲中日關係史上的焦點。其實，在東方會議之前，森恪已與軍部及關東軍參謀等商定「滿洲獨立方案」（註三一），關東軍亦擬訂積極的「對滿蒙政策意見書」，懷有武力占領東北的野心（註三二）。這些方案即爲後來「田中奏摺」的內涵。

「田中奏摺」相傳係於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田中致函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轉呈日皇的奏章，二年後始被刊載，並輾轉流傳，發現很多刊本（註三三）。中外對奏摺本身的真偽有不同的看法，中國方面深信其真實性（註三四），而日本方面則始終否認其存在（註三五）。事實上，「奏摺」的歷史意義已不在於文件之是否存在，毋寧着重於其所引起的反響，正如顧維鈞於九一八事件之後所說：「田中奏摺之真偽曾有辯論，然其披露後發生之事故，與該奏章所載之次第計劃，若合符節，故不能不以該奏章爲日本對華真正政策之具體表現也（註三六）。」連重光葵亦有類似的評語（註三七）。

江口圭一在其『日本帝國主義史論』中，綜合各方論說，認定「奏摺」雖非出自田中本人，但東方會議之決議——「對支政策綱領」內容，確與「奏摺」雷同，正可代表日本決策當局之真正意圖（註三八）。

繼山東出兵，「東方會議」之後，日本商界亦發動「對支商權擁護運動」，露骨表現出濃厚的侵略傾向（註三九）。圍中對華外交的基本方針乃是承認國民黨統治中國，但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華條約上的既得權益，至於滿蒙則應排除在中國之外、即支持張作霖地方政權，以維護日本利權。但這種「滿洲分離政策」，却不爲激進的關東軍所支持，當張作霖於一九二八年初夏，被河本大作大佐陰謀炸死後，遂又改爲支持張學良，但未成功。

無論如何，田中外交思想，仍然是以國際協調爲前提，不像軍部，專爲將來的世界戰爭綢繆，獨自籌劃國家總動員體制。

一九二〇年代日本外交的根本問題乃是缺乏一項取代帝國主義時代外交的理論架構，在擺脫明治以來古老的外交範疇之後，所出現的，是經濟主義的思想，但現實却有很多無法解決的難題（如中國之抵制日貨運動等）。雖然幣原與田中都具有體的構想，致力遵循國際政治的秩序，前者標榜中日之「共存共榮」，後者提倡積極外交，但都失敗。至此，軍部乃高倡國防優先思想，主張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舉國上下亦瀰漫軍國主義思潮。九一八事變的發動即爲此一思潮的試金石，此後中日關係之所以充滿着火藥味，主要實可歸諸於此。

③ 右翼運動的抬頭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對外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大陸政策，其根本原因乃是日本民族「國粹主義」（日本主義）的心態

，造成雄飛大陸對外擴張的熱潮。國粹主義實為明治以來的傳統觀念，此一傳統至昭和時期而極盛，蔚為國家主義運動——右翼運動的潮流，而以「國體論」為其思想核心（註四〇）。所謂「國體」，即國家之形象，性格之意。國體的觀念包涵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政治思想與宗教信仰，一是價值與倫理的國家性格方面。前者具有專制天皇制以及「昭和維新」的復古傾向；後者則表現為忠君愛國的思想與行動（註四一）。

大正年間，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和平氣氛甚濃，民主主義高唱入雲，國體論一時消沈，但「大正民主」却面臨許多難題，不僅對華外交——幣原、田中外交——失敗，日本國內問題叢生，政黨政治腐化，經濟恐慌，農民騷動日盛，工潮迭起，左翼勢力驟興，社會風氣敗壞，且有分崩離析之虞，於是國粹主義思想轉趨盛行，右翼運動隨之抬頭。國粹主義者主張推翻議會，反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擁護天皇，實行天皇制獨裁專制，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軍國中心主義與專制天皇制思想合而為一，具有濃厚的法西斯主義色彩（註四二）。

北一輝與大川周明即是此一時期具有法西斯傾向的思想家，他們領導「猶存社」（註四三），倡導以軍部為中心的國家改造運動。北一輝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成為右翼運動的經典，被少壯軍人及民間右翼革新家奉為圭臬。北氏的主張不僅為「國體論」提供了理論基礎，且激起少壯軍人「改造」的狂潮。一九三一年的「三月事件」（註四四）與「十月事件」（註四五）等，實為北一輝改造思想的具體實踐。

至於鼓煽對外的擴張與侵略，北氏亦不遺餘力。北氏力主日本應充實陸海軍，不惜訴諸武力，以匡正「國際劃界」之不正，且不隱諱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之名，要求佔取澳洲與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以解決日本的土地與糧食問題。此外，他又主張「國家」（指日本）有兩項權利：一是為了解放被壓迫的國家與民族，有權作戰；一是對於擁有廣大領土或不行天道之國發動戰爭之權（註四六）。這種論調無異在灌輸日本對外侵略的使命感，並增進其軍國主義。正如重光葵所說，這種昭和維新思想，帶有濃厚的集權主義的軍國主義色彩，因而成為昭和時期動亂的根源（註四七）。

總之，北一輝等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帝國主義，乃是融合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與大亞洲主義而成，其特徵有三：（一）社會主義在日本國內求實現，與對外擴張為不可分，（二）對外擴張結果所產生的利益，全國民眾有享受權利，（三）將日本的對外擴張與

亞洲民族的解放同樣看待（註四八）。

以陸軍少壯軍人爲中心所組成的櫻會，於發動「三月事件」失敗後，遂又改變方向，轉到滿洲問題（註四九），於是有一九一八事變之發動。其目的乃在解救數千萬陷於水深火熱的中國人，建立一個「王道樂土」——「滿洲國」，這也是「皇道」觀念的發揮（註五〇）。

日本自明治維新，全盤西化後，即以現代文明之先進國自居，自視爲亞洲之盟主，因此認爲啓導亞洲的「落後文明」，維持亞洲的秩序爲其責無旁貸的天職（註五一）。日本人的這種使命感，似可與「白種人的負擔」媲美，但爲「侵略式的博愛主義」，則無二致（註五二）。

(4) 戰略上的考慮

九一八事變可說是日本外交思想的挫折，確立軍事、國防優先思想的契機。軍事優先思想乃是以國防爲主要國策，其他各項政策均淪爲從屬地位的一種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國防的意義，由於受到德國地政學等的影響，常作廣義的解釋。即世界在地形上可五分、四分、三分、甚至二分。在此一分化過程中，超大國的爭霸戰乃是必然的，因而各超大國必須儲藏更多的資源，實施國家總動員體制，將其他大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排除於本國所支配的區域之外（註五三）。這種國防觀念形成「滿蒙正是日本發展國運最重要之戰略據點」的滿蒙論，進而使日本侵佔滿蒙「合法化」（註五四）。由此可見其侵略滿洲是新國防觀念的產物，當然也是基於戰略上考慮的後果。

從戰略上言，日本假想敵有二：即美俄兩國，尤以俄國爲最。日俄戰爭以後，日俄雖然已由敵對關係進入「密約」合作，但日本始終恐懼俄勢南下，威脅其侵略中國政策，因此積極擴充軍備，以俄國爲首要假想敵。日本所推行的「滿蒙特殊化」「滿蒙獨立運動」，除經濟因素之外，實爲基於抗俄的戰略考慮。

日本於一九一八年出兵西伯利亞，乘機干涉俄國革命（註五五），翌年又陰謀指使謝米諾夫（Semenoff G. M.）建蒙古國，無非是基於抗俄的動機。蘇聯共黨當權後，對中日等國都造成「意識型態與戰略的威脅」（五六）。

田中義一之所以極度重視滿蒙，除了經濟因素之外，主要的乃在以之作爲對抗蘇共的戰略基地（註五七）。這種戰略觀

點，在一八一八前後尤為盛行。而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可說是持此觀念的代表人物。

板垣與石原對滿洲軍事價值評價甚高，因此所擬「滿蒙佔有計劃」之積極，可謂無與倫比。關東軍的戰略思想，乃是以蘇俄為目標，其後由於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抬頭，排日運動之波及滿洲，一九二八年又將中國列入，但基本上仍視為阻扼蘇俄之要塞。及至共產主義滲透中國日甚，赤化之危險日亟，滿洲對蘇戰略上的價值乃愈重要（註五八）。關東軍遂認為有佔領北滿之必要，蓋不僅可由此解決日本北方的國防問題，同時又能毫無阻礙地向南方發展（註五九）。

石原繼承了日本傳統的國粹主義思想，「雄飛海外」的擴張主義等文化遺產，充滿創「霸業」，居「盟主」的野心。板垣與石原都在戰略上以蘇聯為敵對目標，却在理論上仍視美國為阻撓日本大陸政策的最大敵人。石原深信歐戰期間西洋的文明已移向美國，未來的戰爭當以日本為中心，掀起東西兩大文明的代表——日美——爭霸戰，成為真正的世界大戰，也是人類最後的大戰爭（註六〇）。

石原既自認日本將為東方的代表勢必與美國作殊死戰，因此當前的急務是迅速擴張其勢力範圍。滿蒙為日本戰略上的要地，且為統治朝鮮，支配中國的根據地。占有滿蒙，即可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而其豐富的資源亦為日本所必需，日本如要「雄飛」世界，必以取得此一良好的戰略位置為要件。日本如能完全控制滿洲，則可阻扼蘇俄之東進，這就是基於戰略上的考慮，而發動一八事變，其目的無非在達到此一戰略目標。

(5) 經濟因素

一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固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構造，以及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其直接的契機則是受到世界性不景氣影響所引起日本經濟與政治的危機。一九三〇代的世界經濟恐慌，的確給予日本資本主義嚴重的打擊，同時由於日本國內經濟的惡化，以及對外（主要為對華）貿易的銳減，對於滿洲的需求益甚。

先就日本國內的經濟情況來看，一九二九年以後，物價慘跌，股票價格與批發價格驟降，各行業利潤大為減退，生產大受限制，對外貿易之萎縮，甚至較諸生產之減退為甚，加深了不景氣的嚴重程度。日本輸出入在一九二九年呈減半之勢，尤其日本貿易商品、市場均呈集中傾向，更使其所受打擊加重（註六一）。

由於經濟上受到不景氣的嚴重影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三十多年來所懷抱，對隣邦中國（尤其東北）的領土野心乃日益顯露，足爲其商品市場、投資市場，以及各種資源供應地的滿洲，被認爲是拯救不景氣危機的一個地區。日本軍國主義者既認定滿洲足以彌補其市場的狹隘與資源不足之弊，遂擅定滿洲爲其攫得的目標。

滿洲不僅地廣人稀，交通便利（鐵路長度約占全中國之半），礦藏豐富，森林蘊藏甚豐，且富農業資源，肥沃而廣大的可耕地，更足以容納大量的移民，地狹人稠的日本對此當最垂涎。

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於一九二八年年底，編纂一篇「滿蒙政策私論」（註六二），對東北的經濟資源作了詳盡的調查與估量。此篇報告分析東北貿易的概況與將來的趨勢，於「日本對滿洲貿易的展望」極爲樂觀，認定日本在經濟上不僅視滿洲爲「亞洲的寶庫」，且足爲「歐美的穀倉」（六三）。其次是移民問題的評估。日本的「對滿移民」乃是以當時日本人口問題而設計的一項五十年計劃。根據日人的推算，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的五十年，日本將承受很大的人口壓力，日本自己生產的米糧僅能維持半年之食用而已。因而斷言，如不能佔有滿洲，則日本將無法生存。解決此一問題的根本方法，乃是武力取得滿洲，軍部、尤其關東軍對此尤爲積極。

陸軍中將松井庫之助於一九二四年，撰「護國要論國民軍事學」一書，已提倡積極向滿蒙發展之說（註六四）。一九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日本陸軍最高領導者之一的宇垣一成，在其日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亦提及日本資源欠缺之問題，主張「在經濟上滿洲內蒙與日本爲同一單元，爲日本生存最低限度的條件」（註六五）。翌年，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本庄繁草擬的「對支作戰在何種動機下發動之研究」（註六六）一文，明確的暴露其對滿洲資源的野心。本庄預料「（日本）帝國的出路，最壞的打算是由朝鮮半島、日本海，與（中國）大陸連接，而以滿蒙爲中心，吸收其資源」。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滿蒙及華北一帶的物資是（日本）帝國國防上唯一的糧源，開發其地，提高其經濟價值，使之無論平時或戰時都能達到足以提供日本需要之程度，並且促進其與帝國間的關係，加以誘導、統制，俾能滿足上述之需要，實爲保障日本及日本人永遠生存唯一緊要之方策，且爲帝國存亡攸關之重大關鍵（註六七）。」

一九二七年「東方會議」所決定的「對支政策綱領」（其中「滿蒙計劃」等，即是「田中奏摺」的內容），亦特別強調

對滿蒙之特殊考慮，以及「有覺悟採取適當措施」的決心。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會議之前關東軍司令部所擬定的「有關滿蒙政策之意見（要旨）」，開宗明義即表明：「關繫我帝國（指日本）將來命運的人口及資源問題，以向外發展以求解決爲首要」。「其發展的重點應着重於滿蒙及西伯利亞方面」，而以「扶植東三省及熱河特別區域的勢力爲對支政策之基調」，續又詳細臚列日本向中國方面要求的事項，迫使張作霖承認，如被拒，則另推舉東三省長官取代，「如有阻撓我（日本）對滿蒙政策之實施者，則斷然予以排斥，須有訴諸武力的準備（註六八）」。「此一「綱領」不啻爲關東軍等發動九一八事變的藍圖，正充分表露日本對東北資源之垂涎，以及經濟因素所占地位之重要。

再就石原與板垣所持觀點，即能明瞭日本對東北經濟資源重視之程度。一九三一年五月，石原撰擬「滿蒙問題私見」一文，提到滿蒙的經濟價值說：「滿蒙的農產足以解決我國（指日本，以下同）的糧食問題。鞍山之鐵、撫順之煤足以確立目前我國的重工業，滿蒙的各種企業救濟我國目前的失業者，並可開拓景氣。滿蒙的資源足以支持我國作爲東方的代表，雄飛世界（註六九）」。「板垣所撰寫的一篇「關於滿蒙問題」文中，亦有同樣的看法（註七〇）。足見關東軍決策當局，均着重東北的經濟價值，以爲取得東北，即可解決日本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並可向世界進軍。

不僅軍方如此，民間亦復如此，滿鐵調查課長佐多弘治等，亦有「確保東四省經濟活動絕對自由」之主張（註七一）。東北的資源雖富，但是否如日人所說，足爲日本「生命線」，即其資源豐富到足以解決日本的一切問題？根據田中隆吉後來在「東京裁判」中的証辭，却與上述各種說法不同。當時受命實地調查滿洲資源的田中，認爲「東三省」本身似仍無法自給自足，但奉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之命，擬定了一項計劃，即確定除了石油有待開發之外，均可自給自足。此一自給自足計劃，於一九二九年八月，曾在參謀長會議席上分發，作爲一種宣傳資料，即對日本全軍渲染東北是日本國家生命線的說法（註七二）。由此可見軍方強調東北資源及經濟價值，實已超越了實際的估量，而可看出其侵略本質。

就實際的情形言，對日本具有如此重要性，期待甚殷的半殖民地滿洲，一九三〇年却亦同樣受到經濟不景氣的襲擊。大豆及農產品價格慘跌，農產品輸出銳減，工商業不景氣，生產量大減，銀價暴跌，一般民衆購買力均極薄弱。

當時東北的輸出入，日本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一九三一年爲止，五年平均，輸入方面佔四三%，輸出佔四六%，且有

增加之勢（註七三）。日本對東北的投資額高達十七億五千萬日圓以上，占當時所有外國在東北投資額的七十%，其比重甚大。根據「滿鐵調查部」的調查，日本在東北經由投資、貿易等所得利益，僅一九二九年一年，即已達三億日圓以上（註七四）。但不景氣不僅影響到日本資本在東北所獲得的廣泛利益，且對於因運輸滿洲特產品而獲暴利的「滿鐵」，亦是一大打擊。加以中國農民對「土地商租權」的抵抗（註七五），在在使日本資本與中國、列強資本的競爭結果所得利潤減少，揭發民族主義大黨的張學良政權所推動收回國權運動——如與滿鐵並行線鐵路之完成，滿鐵包圍鐵路十五年計劃，取代大連港之葫蘆島建港計劃，新礦業法等，對日本資本構成很大的威脅，引起日本宣傳「滿鐵赤字問題」，而「日本的生命線」，「滿蒙權益的危機」乃甚囂塵上。

「生命線滿蒙」、「生命線」、「日本的生命線」這類詞句，無非都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爲了對外擴張所杜撰的口號。「生命線滿蒙」出自松岡洋右之口（註七六），其後爲陸軍所採用，並擴大而成爲全國性大眾傳播的口號，在喚起危機意識，侵略衝動方面頗富煽動性（註七七）。這種「生命線」觀念一旦深入日本人心，則軍國主義日本對滿蒙採取強硬舉措，必將廣受人民的支持。

Ⅰ 外在因素

就日本而言，中國民族主義的興盛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實爲其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外在因素。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日盛。國民黨的影響較弱的東北，到一九二七年以後，民族主義運動驟昂。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逐漸收回過去被列強（尤其蘇俄）支配的利權。張學良奪回中東鐵路失敗後，矛頭轉向日本，對於過去不明確而無合理根據的日本權益或特權，均徐圖廢除。一九三〇年，由於抵制日貨運動，加上世界經濟大恐慌，「滿鐵」的經營由盈轉虧，甚至有大量赤字的紀錄（註七八）。

此時國際環境對日本造成有利因素，東北邊境蘇聯軍事力之增強，對日本構成一大威脅，但蘇軍之擊退張學良奪取中東鐵路，對於極端恐懼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日本，增加了信心，且在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尚未完成之前發動軍事行動，確爲最好的時機。而最足左右，影響遠東局勢的美英兩國，却因普受不景氣的影響，而態度消極，當亦造成日本自由採取武力行動

的有利條件。

(1) 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失敗退回關外以後，東北掀起了收回利權的熱潮，這雖與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之高昂有關，但主要仍在東北社會之遞變，民衆已有較高的民族意識。一九二三年一月，吉林省首先提出收回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要求，獲得旅居北京之人士所組「東三省老鄉會議」之支援（註七九）。翌年，奉天等省要求收回「關東州」附屬地，及滿鐵沿線中國住民之司法權，收回教育權之呼聲亦高唱入雲（註八〇）引起中日糾紛最烈的，是張作霖開始修築打通路、吉海路，試圖打破南滿鐵路之獨占路線。同年，設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專司鐵路新設事宜，以對抗日本（註八一）。

此外，張作霖政權又致力於排除日本的各種侵略，尤其力主二十一條的無效，對該約中約定的土地商租權、礦業權等加以種種限制，同時展開撤郵及收回教育權運動（註八二）。

及至一九二七年，東方會議後「田中奏摺」喧騰一時，給與中國更大的衝擊，排日運動轉趨強烈。日本屢次照會奉張，要求取締，但未能壓制（註八三）。

標榜刷新對華政策的田中義一內閣，於東方會議後，先令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向東三省提出解決各項懸案的強硬要求，續又任命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向奉張提出滿蒙新五路之要求（註八四）。

是時北伐軍進入山東，田中命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與南京政府談判，並勸奉張退回關外。意在使東北與中國分離。不久，濟南事變發生，奉張於五月初通電停戰，日本進迫益急。五月中旬，奉張與山本簽訂滿蒙新五路密約之後，本有與北伐軍一戰之決心，旋因日本之嚴重勸告而退出關外（註八五）。

日本原有截擊奉軍之計劃，後因顧慮美國的動向，且認為奉張已接受日方條件，遂放棄原定計劃並決定保留奉張的地位（註八六）。但是關東軍過激分子對奉張之抗日政策極度反感，不以田中內閣之政治交涉為然。因此最初陰謀擬截擊奉軍於錦州北方之大凌河畔，解除其武裝，改推張學良為首，使其與南京政府對抗，以創造日本完全控制的新天地。後因受阻於田中之命，乃改採第二計劃，即炸死張作霖。暗殺張作霖是由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主謀，其目的乃在殺害張作霖，引起混亂

局面，再乘亂出動關東軍，以控制東北。但因奉天當局秘而不宣，沒有發生關東軍所預期的紛亂，東京的陸軍部亦力加阻止，因而使關東軍之詭計未能得逞（註八七）。

張作霖遇炸事件的影響有二：一是日本駐外軍隊擅自採取行動，雖其陰謀失敗，但未受應有之懲處，遂啓在外駐軍擅專之端緒，造成所謂「下剋上」的風氣。二是以此爲契機，張學良政權歸順國民政府——易幟，此後日本解決東北問題，必須以國民政府爲對象，並面對中國民族主義之高昂，張政權更積極收回利權運動，中日關係愈形緊張，而關東軍及陸軍少壯派軍人乃更蠢蠢欲動（註八八）。

七月，張學良繼任爲東三省保安司令，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反日色彩益爲濃厚，決心與革命軍議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出面阻止，張學良置之不理。不久，日本派特使林權助至瀋陽，大事威嚇，力阻其與南京妥協，張學良不得已允延期三個月。其後一因張學良與日本續商易幟順利，一因英美聲明滿洲爲中國領土，美國甚至否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至十二月底，東北正式豎立青天白日旗，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爲東北邊防司令，並發表東三省與熱河等四省政府主席，改奉天省爲遼寧省，全國完成統一。

一九二九年，張學良以楊宇霆、常蔭槐反對易幟爲藉口加以槍殺，表明其對日本的敵對態度，東北的局勢愈趨緊張。另一方面，對日本在滿洲權利之阻撓日甚。東三省交通委員會於一九三〇年五月，計劃興築以葫蘆島爲起點，經綏遠、黑河、多倫的三大幹線，與「滿鐵」相抗衡，同時與荷蘭築港公司訂立借款契約，積極籌劃葫蘆島的開港計劃（註八九）。滿鐵受到空前的挑戰，正面臨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懼與焦慮反而激起日本軍國主義多年來所懷抱，絕對的，獨佔整個滿蒙地方的慾望。九一八事變的原因雖多，滿鐵問題則爲其中之一，而其導源實爲中國民族主義之高昂。

(2) 國際背景

遠東的國際情勢與之較密切的，是美、蘇、英等國，而當時的國際背景，正因各列強遭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自顧不暇，蘇聯亦在推行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尚無強大的退阻力量，日本有機可乘，成爲發動軍事侵略最適切的時機。

先就遠東情勢的關係言，美英兩國的海軍力量實構成日本的一大威脅。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結果，

英日同盟廢止，九國公約成立，英美日三國海軍主力艦雖訂定五、五、三之比，却給予日本以「滿蒙」自由行動之便利。易言之，華會雖使日本在對華權益方面稍有後退之勢，但未影響其在滿蒙之地位（註九〇），同時却取得英美對西太平洋各島不設防的承認，因而使日本在遠東的海權得以伸張（註九一）。

一九三〇年的倫敦裁軍會議，美國增加海軍艦艇之噸數比例較之日本為低，足見其海軍實力並未增強。但日本仍恐日美海軍比率對其不利，蓋日本之增加數已達飽和，而美國則仍有擴增之可能，至有效期限（一九三六年）之前，深懼美國會擴張，因而非着機先發動軍事行動不可（註九二）。

以上係就軍事觀點分析，再就經濟問題言，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恐慌，給予美國很大的打擊。美國工業因而生產銳減，失業人數驟增，整個經濟社會陷於混亂（註九三），因而降低其對國際問題積極參與的興趣，保守派孤立主義勢力抬頭。不景氣又使美英兩國在經濟問題上產生對立，使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確信美英不致於對日本採取共同的立場加以干與，甚至期待帝國主義各國對日本在滿洲所採取的反蘇行動——反共防波堤——給與同情，這種判斷至少就英國的反應而言，是正確的。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 L. Stimson）評謂：「日本侵略滿洲，考慮避免受世界干涉所擬計劃，的確是最好的時機，且選定中國因其他事件而不能抵抗的時機。」可說是一言中的（註九四）。

其次就英國的態度加以考察。英國所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也很大。雖然它與美國的情況不同，其經濟復甦較快，但因不景氣之來臨太急促，且由於英國政府放棄金本位制，國家機構直接介入經濟，使英國人格外感受到不景氣的嚴重。且由於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間，大量的失業人口，英國人甚至有如羅馬帝國衰亡時期災難即將來臨的感受（註九五）。

就軍事力言，英國此時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低的狀態。一九二〇年的英國在軍事上似乎是所向無敵，但在在一九三〇年的倫敦裁軍條約，却不得不同意與美國居於同等的實力（註九六）。英國海軍在西太平洋海域顯然已呈頹勢。新加坡的要塞建設計劃却一直延宕。英國海軍在海軍技術與戰略理論方面，均有落後現象。英國是最先獨立設置空軍的國家，但由於軍內部的歧見，空軍與海軍配合作戰的理論性並未建立。不僅國內問題叢叢，且印度問題亦感棘手，因而對遠東問題當較消極（註九七）。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英國外交界所採取的是「不願犧牲多大，亦將盡量介入」的態度（註九八）。且事關滿洲，則英國外交部大都屬於親日派。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因由於對帝國主義共同的權益有相當的瞭解，一方面則是顧慮日本一旦採取反英行動時，英國軍事力之薄弱。因此，爲了維護其在華的權益，充其量只能有消極的反日，而其政策本質上是「被動的」（註九九）。

此外，英美關係並不融洽，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的中立，戰後的債務問題，海軍力比率等問題，均爲原因（註一〇〇）。因此甚難與美國協調，採取一致的步驟。最值得注意的，無論英國或美國，都不願過分壓制日本，激起日本的反感。英美兩國的態度既如此，俄國的態度究如何？俄國與滿洲的關係甚深，在日俄戰爭以後，俄國在北滿的勢力並未減退（註一〇一）。一九三〇年代，俄國在北滿的農產品運銷方面仍居重要地位（註一〇二）。

日本對蘇俄最爲戒懼的，是共產思想對中國（尤其滿蒙）的影響，如中國內地蘇維埃區之形成，中國紅軍之強化，國民政府剿共之失敗，國民黨內「容共妥協派」之存在等。但對日本威脅最大的，仍爲其軍事力量之擴大。蘇聯在滿蒙邊境軍事力量之增強，第一次五年計劃（一九二八—三二年）之順利推行，西伯利亞工業中心地之創設等，激起日本獲得一個分離中國與蘇聯的前哨基地的願望，而伺機進行其準備工作。關東軍尤其憂慮蘇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之後，續行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二—三六年），給予日本很大的威脅，因此必須先下手爲強。

總而言之，無論是中蘇英美等國，都因埋頭於本身的問題，沒有在滿洲問題上採取軍事行動的餘力，故無法壓抑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行動（註一〇三）。

三、軍國主義之確立——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與偽「滿洲國」的建立

(1)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與中國的反應

九一八事變並非關東軍與軍部中央「下剋上」策劃的結果，而是兩者的「共同陰謀」。就其對滿積極政策，採取武力行動一事言，軍方上下的意見是一致的，只是在時間與方法上稍有差異而已。

軍部中央早有「滿蒙問題解決方案」之擬訂，雖有部分顧慮到蘇聯的干涉而持慎重論，但大部分仍贊同速戰論（註一〇四）。「三月事件」失敗之後，「國外先行論」抬頭，而關東軍實際的領導者板垣與石原等，唯恐人事調動，使其計劃延宕（註一〇五）。一九三一年五月，少壯派軍人已決定採取陰謀手段，與關東軍幕僚保持緊密的連繫。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初夏所舉行的兩次會議（第一次在六月間，第二次在八月初），足以顯示軍部中央與關東軍連繫之密切（註一〇六）。關東軍的武力侵略計劃獲得軍部有力分子的首肯，此由後來二十四公分口徑的二門榴彈砲自東京運往奉天即可得見（註一〇七）。

其實，日本軍部自一九二八年即已開始擬定對滿武力計劃（註一〇八），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七月間，尚有四種計劃（註一〇九）。其中尤以石原莞爾的構想為最值重視。一九二九年七月，石原等在其所謂「參謀旅行」北滿途中，已擬有「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此一計劃之目的乃是由日本直接統治滿蒙地區（註一一〇）。奉石原之命所撰「滿洲占領地行政之研究」（註一一一），都是屬於「滿蒙占有」的原始計劃，其內容不外乎為關東軍占領滿洲，由日本人出任總督或由日軍司令官實施軍事統治。而其計劃重點乃是如何策劃以一萬餘的關東軍去壓制二十萬的中國軍隊，並避免列強可能的干涉。

在關東軍積極策劃，鼓動對滿採取軍事行動之際，在東北的日本人亦有推波助瀾之作用。一九三〇年前後，居住東北的日本人約有一百萬人（其中韓國人達八十萬人），對滿投資極為龐大，但因不景氣以及張學良政權的排日政策與中國民衆的抗日運動，給與在滿日人危機感。這些日本人無形中養成一種「滿洲日本人」意識（註一一二）。他們屢組遊說團返日，喚起日本國內對其所處危機的重視，並組成一「滿洲青年聯盟」（三千成員），其行動與思想及政策主張，對後來「滿洲建國」有相當的影響（註一一三）。

東北的局勢由於「萬寶山事件」（註一二四），「中村事件」（註一二五）而倍增緊張，加上中國民族運動極為高昂，收回國權的要求甚盛，日本面對中國的「排日、侮日」，勢須在滿洲實行大變革的意見佔優勢，於是以石原為中心的關東軍遂將此一趨勢付諸行動，斷然採取武力行動。

雖然此時中日兩國仍有部分人士憂慮東北情勢之惡化，致力挽救，如湯爾和、林久治郎會談於遼寧，宋子文與重光葵不斷熟商，尋覓根本解決之策，一時中日關係似有好轉之希望，但未有結果，故未及阻止事變之爆發（註一一六）。

八月間，已有關東軍即將在東北發動事變的謠傳，外相幣原亦得到奉天日本總領事的報告，詢諸陸相南次郎，並請設法阻止，日本天皇亦垂詢「軍紀」問題（註一一七）。陸軍遂決定派遣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滿洲，以遏止關東軍的「妄動」，建川雖於事變前抵達，但未達成任務（註一二八）。據事變主謀者之一的關東軍參謀花谷正透露，柳條溝事件的計劃在一九三一年春已擬定，鑑於皇姑屯事件之失敗，擬一夜即占領奉天，並在各國干涉之前，占領預定的地區，同時希望少壯派軍人（橋本欣五郎等爲首的櫻會成員）發動國內政變，以資呼應，並設法取得朝鮮軍的支援（註一一九）。

關東軍於九月中旬藉口檢閱隸屬部隊，舉行夜間演習，並定二十八日爲舉事日期，旋因陰謀部分洩露，遂決定於十八日發動（註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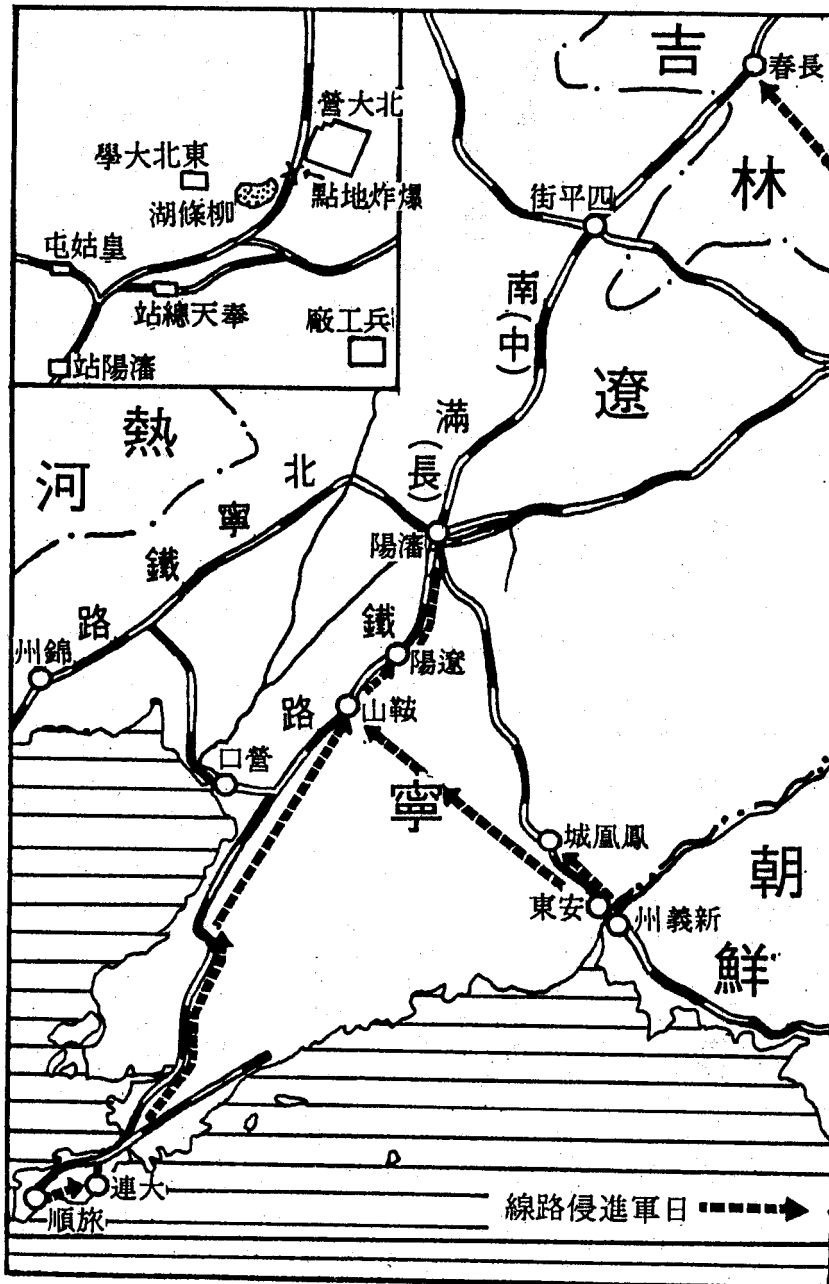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點半，日本駐滿鐵路守備隊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溝滿鐵線軌，關東軍大舉出動，攻擊北大營，揭開了九一八事變的序幕。

日方出動的兵力有二：一爲獨立守備隊，一爲第二師團，當夜在東北的日軍幾乎全部出動，兵力總數約有一萬餘（註一二一）。但東北邊防軍則共約二十萬人，半數駐關內，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與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均在北平，吉林與遼寧省當局事先皆無警覺，全未作準備。關東軍一萬餘人於短期內即佔領瀋陽城，翌日，長春、營口、安東等地先後失陷，朝鮮日軍亦越境出動，進向遼陽、吉林。日軍之所以勢如破竹，以寡擊衆，一因武器良窳有別，一因中國軍隊之不抵抗政策。

當時中國經過八個月的中原大戰，元氣大喪。東北軍入關以後，東三省駐兵減弱，張學良又長期留駐北平，注意力轉向國內。因此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與張學良在萬寶山事件後，曾交換過避免和日本衝突的意見。七月初旬，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爲了挽救東北萬一與日本開戰敗北而「萬劫不復」，應力避衝突。中旬，蔣主席密電張學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于右任亦表示，應以「平定內亂爲第一」。在國民政府「攘外應先安內」的政策下，東北軍奉行不抵抗命令（註一二二）。

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在形式上採取被動的低姿勢，事實上採取強硬態度，但對國際聯盟則期待甚殷，於九月二十一日，由施肇基代表，向國聯行政院要求，依盟約第十一條處理九一八事變（註一二三）。

圖變事陽藩八一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十一期

一八

。一八頁，册上『史爭戰日中次第二』湘相吳自轉

日本外相幣原於十九日晨，始由報紙得悉瀋陽事變的爆發，可見日本外務省肆應事件進展方面頗爲遲緩，只能緊跟在軍部造成的既成事實之後，致力向列強辯解而已。事件發生以後，若槻禮次郎內閣決定不擴大事變的方針（註一二四），關東軍却置之不理，一週內即進佔長春、吉林省城。日本政府再命退集南滿鐵路附近，不得進兵北滿，甚至奏請天皇制止（註一二五）。關東軍雖一時稍爲收斂，但與日本政府之間已成對立之勢。十月間所發生的二事件——關東軍獨立事件與「十月事件」，影響到日本的國策與對滿政策的根本方針。前者雖屬流言，但爲關東軍術策之一種；而後者則爲一項規模不小的政變計劃，其後雖被壓制下來，但參加的軍官却只受到輕微的處分。此後少壯軍人更跋扈而肆無忌憚（註一二六）。

瀋陽失陷後，東北邊防公署及遼寧省政府移設錦州，關東軍宣稱否定錦州政權存在。十一月，關東軍以蘇俄表示無意干預，乃進軍黑龍江，佔領齊齊哈爾之後，進兵錦州（註一二七），敷衍了幾次「臨參委命」，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佔領錦州，並奪取哈爾濱，整個東北在一百天內全部淪陷。

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並非全不抵抗。東北邊防軍雖奉命不抵抗，但自動抵抗的亦不少。除馬占山之外，有吉邊鎮守使李杜、代理中東鐵路司令丁超，進出於依蘭與佳木斯，于芷山下反正於通化，李海青出沒於中東路南線。吉林有民政廳長誠允、團長馮占海，及起自民間的王德林，遼寧有唐聚五、鄧鉄梅等，分稱自衛軍，或救國軍、義勇軍，各方兵力約達二十萬以上（註一二八）。其中尤以馬占山的黑龍軍最爲勇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馬軍在吉林省境中東鐵路嫩江橋畔襲擊關東軍，給予重創，戰果輝煌，馬占山成爲抗日英雄。東北義勇軍的武裝抗日運動使關東軍疲於奔命，甚至出動幾個師團「討伐」，直到一九三三年春，義勇軍始被迫退出東北（註一二九）。

除義勇軍的武裝抗日外，全國性的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本貿易打擊甚大。自一九〇八年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二辰丸案）後，至九一八事變前，共有八次，但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應首推此次事變所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

一九三一年七月，以萬寶山事件爲契機，上海等地已燃起抵制日貨運動，至九一八而熾烈化，發展成「對日經濟絕交運動」。

上海的全國商會聯合會（主席林康侯），於九月二十四日召開緊急會議，向各省市縣呼籲羣起抗日，要求國民政府集中

全力講求對日有效方案，並提議在各商會舉辦軍事訓練（註一三〇）。

同月二十六日，上海召開市民大會，要求日軍撤退，否則應斷交，並向全國呼籲對日作永久性經濟絕交，嚴懲出售日貨之奸商（註一三一）。這次抵制日貨運動無論在規模、性質上，俱與過去不同，充分顯示與日人斷絕一切經濟關係之決心（註一三二）。

一九三二年上海事變發生，抵制日貨運動更如火如茶的進行。日本輸往中國的貿易額，自一九二五年的四億六千萬，至一九三〇年降為二億二千萬，一九三二年更降至一億三千萬，其後二年，每年僅有一億一千萬（註一三三），足見其影響之大。

自五四運動以來，學生運動頗為積極，其間雖間有捲入政治鬥爭，但其愛國熱忱，似不能概予抹煞。九一八事變一起，關東軍的侵略行動激起中國各地的抗日風潮，居領導地位的，大多是報界人士、學生等知識分子，而以上海為最積極。

九月二十日，上海滬江大學開始請願運動，接着即成立「抗日救國會」（註一三四）。北平亦由清華、燕京二大學開始，各界亦於二十七日發起民衆抗日大會，遊行示威，並南下請願，要求對日宣戰（註一三五）。南京中央大學亦集合數千學生，提出同樣要求（註一三六）。

十月，上海、廣州等地，發動相當規模的請願、示威（註一三七）。十一月中旬，因感國際聯盟無力制裁日本，學生請願情緒轉趨激烈，人數亦加多。及至十二月錦州告急，國民政府有設置中立區計劃，學生羣起反對，要求退出國際聯盟，對日宣戰，恢復民衆運動等（註一三八）。

(2) 偽「滿洲國」之成立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雖然在軍事方面進展甚速，但本來所倡「滿蒙領有論」，則受內閣不擴大方針以及「滿洲青年聯盟」主張的影響，而不得有所修正，改為樹立一個親日的獨立政權。九月二十二日，關東軍接受建川美次的建議，決定以權謀術策，實現新政權樹立的構想，並擬定「滿蒙問題解決策案」（註一三九）。地方政權的樹立首先由吉林省着手，即強迫其脫離國民政府而宣布獨立（註一四〇）。但日本政府與軍部均表反對。關東軍遂又將「擁護既得權益」的口號改為「建

設新滿蒙」，進行建立一個在日本保護下的滿蒙獨立國，並選派滿鐵總裁內田康哉於十月中旬赴東京，傳達上述意願。日本政府對關東軍的強硬政策雖仍表反對，但已無法控制東北局勢，唯有追認既成事實而已。

東三省各地則在關東軍的策劃、威壓下，着着進行所謂「自治運動」（註一四一）。十月間，日本「十月事件」的陰謀暴露，又有關東軍獨立的流言，關東軍的阻力愈小，一方面擬定「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案」（十月二十一日）、「滿蒙自由國設立案大綱」（十一月七日）（註一四二），一方面由土肥原賢二負責進行劫取溥儀的陰謀。外相幣原等對關東軍之擁立溥儀計劃，表示絕對的反對（註一四三）。當時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儀亦懷疑關東軍的真意，不願應命。但土肥原則依照原定計劃，以其擅長的陰謀手段，擾亂天津的治安，對溥儀軟硬兼施，於十一月初旬，成功的誘引溥儀到旅順（註一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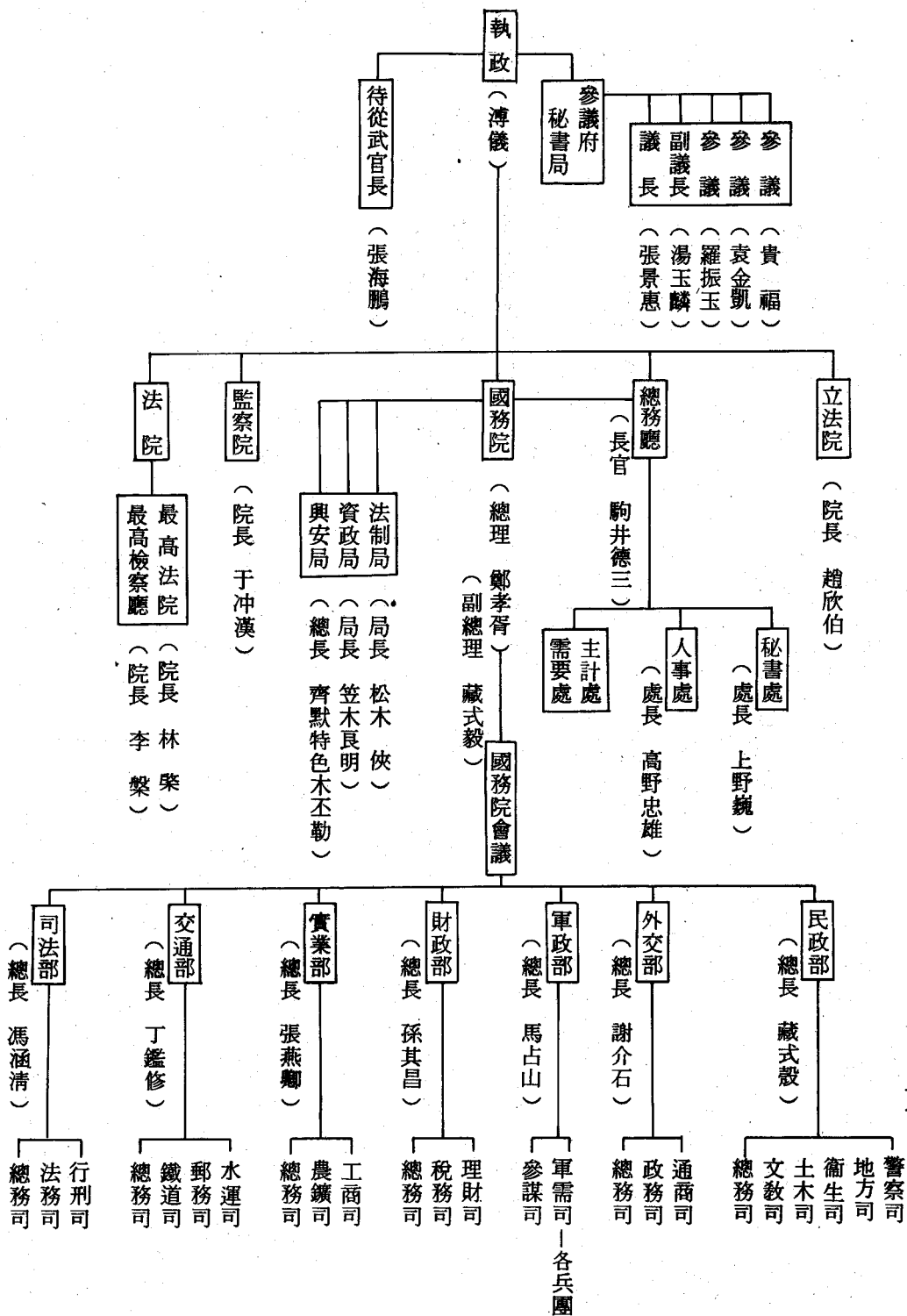
東北的政治體制，自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至翌年一月，先後醞釀各地自治組織（註一四五）。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二月，關東軍召開一連串的幕僚會議，商討新國家建設的步驟，決定組織一中央政務委員會，檢討新國家的名稱、國旗、政治制度、人事等問題。其間分別與溥儀以及各省主席洽商「建國」事宜（註一四六）。至二月十七日，成立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商定國家形態及組織，關東軍摒除復辟、共和制等提案，決定推溥儀為國家元首，旋又確定新國家國號為「滿洲國」（註一四七）。

二月二十五日，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發表「新國組織大綱」，同時完成「政府組織法」與「人權保障法」（註一四八）。根據「政府組織法」，設執政、參議府、立法院、國務院、監察院等。國務院之下設外交、民政、軍政、財政、實業、教育、司法等七部。總務廳掌理行政事務，總務長官以下次長、處長等均為日本人。這就是所謂「內面指導」，實際控制的原則（註一四九）。

三月一日，「委員會」發表建國宣言，在長春（改稱新京）舉行盛大的建國儀式。九日，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鄭孝胥為總理，定年號為大同，「滿洲國」正式誕生（註一五〇）。十日，溥儀與本庄交換「公文書」，關東軍對新國家的支配遂合法化（註一五一）。此一換文簽署日期雖為十日，實際上則在六日，溥儀與板垣在湯崗子晤商時，即已被迫簽定，而其細則

表織組府政央中「國州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十一期



三三

則早在一月底即由關東軍幕僚迫使溥儀承認（註一五二）。依據此項換文，「滿洲國」將國防及治安重任委諸日本，並承認關東軍有管理鐵路、港灣、水路權能，以及重要官吏任免大權。

偽中央政府組織已完備，地方行政機構亦分別設置（註一五三），但由上項「換文」規定，人事實權均操在日人手中。行政中樞的總務廳長官由日人擔任，其他各部次長、處長、亦俱由日人充任。因此，偽滿洲國的一切行政，實由日人統制、操縱（註一五四）。

八月，日本任命武藤信義為駐滿全權大使，同時以關東廳長官名義，管轄南滿鐵路，又兼駐軍司令之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九月十五日，由武藤信義與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奠定了日本對「滿洲國」所謂「內面指導」的法理基礎，同時以之為日本對「滿洲國」的正式承認（註一五五）。此一議定書的內容主要乃是「滿洲國」承認日本在滿蒙所獲得的既得權益，以及日本有派兵駐紮之義務，由此足見此一新國家，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註一五六）。

(3) 日本之一意孤行——退出國際聯盟

中國於事變後，按盟約第十一條規定，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以求制止日本的侵略。對於日本軍事行動係出自自衛權的發動的說法加以駁斥，並取得國聯中小國的同情與支持。但英法德義各列強，為了肆應不景氣的問題而自顧不暇，實在無法兼顧遠東問題，因此，自始即採取消極態度（註一五七），結果端視美國態度而定。美國雖非國際聯盟的一員，但曾是「國聯」創始國，且對國際問題頗表關心。唯事變初起時，認為只是地方性的局部衝突，且對幣原外交頗有信心，故亦避免干與，捲入此一漩渦。但因十月初日軍轟炸錦州，受到很大的衝擊，於是決心派遣觀察員參加國際聯盟理事會（註一五八）。錦州轟炸造成美國態度改變的契機。十二月，日本民政黨若槻內閣總辭，改由政府會犬養毅組閣。翌年一月，日軍佔領錦州，使美國態度轉趨強硬，國務卿史汀生遂於一月七日發表所謂的「史汀生主義」聲明，宣示美國不承認以武力改變現狀（註一五九）。此一聲明雖不能發展為經濟或武力制裁，僅止於道義的譴責，但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予日本精神上嚴重的打擊，對於後來國際聯盟處理滿洲問題，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唯就當時的局勢而論，「史汀生主義」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悍然拒斥，其他列強態度消極，因而不能發揮實質上的遏阻效果，日軍的擴張範圍遂日益擴大。

日本政府唯恐戰局擴大，滿洲問題成爲國聯討論的對象而受到列強的壓力。蓋不僅無法控御關東軍，復難排解大多數對採取武力維護日本在滿洲權益的關東軍表示強烈支持的輿論。其後日本爲了滿洲國的承認等問題，遂與國聯發生激烈的對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國聯開會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實地調查，以解決中日間的爭論。翌年一月十四日，正式派遣一個以英國的李頓（Victor A.G.R. Lytton）爲團長、法義美德各國爲委員的「李頓調查團」（註一六〇）。

李頓調查團於二月二十九日抵達東京，旋即轉往上海、南京、漢口、北平，於四月間進入東北，作實地調查，於六月間折返北平撰擬報告書。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國聯決議成立調查團以後，日本的軍事行動却反而日益擴大，於一月三日佔領錦州，二十八日，發動上海事變——淞滬之役。此役實爲日軍一項謀略，即爲了轉移各國視線，由關東軍授意駐滬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所策劃（註一六一）。由於中國軍隊之英勇抗戰，戰火擴大。日本因恐列強干涉，於加派三個師團兵力占領上海北方之後，在英美法各國調停之下，於五月五日，簽署停戰協定（註一六二）。

淞滬之役充分顯示中國軍隊，民衆游擊隊，中國商民抵制日貨運動等，軍民合作抗戰的實力，且因列強對日態度強硬，遂使日本的侵略受到遏止。但東北的情勢並未好轉，日本軍國主義並未放棄或收斂其侵略，反而變本加厲，於九月十五日，於「日滿議定書」簽署之日，承認「偽滿洲國」。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日內瓦、東京二地同時發表。「報告書」長達十八萬字，共分十章，前八章爲事實的敘述，後兩章爲解決爭論的原則、條件與建議。簡言之，對於日軍在九一八事變的行動，不認爲是合法的自衛手段，而是有計劃的侵略，確認滿洲係中國的領土，中國並非無組織的國家；但承認滿洲的特殊性，勸告中日兩國商定新約，以釐清兩國之權利、義務，並在中國主權範圍內，允許東三省高度自治權，以之爲基礎，促進中日經濟合作。而斷定所謂「滿洲國」爲日本的傀儡組織一事，更不爲日本所願（註一六三）。

日本於十一月二十日，發表意見書，力加反駁，並聲明反對「報告書」所建議的解決方案。日本輿論亦一致擁護日本政

府，羣起「聲討」國聯。

十一月下旬起，國聯召開理事會討論李頓報告書。日本則派松岡洋右爲首席代表赴會。日本政府初無退出國聯的意向，甚至連松岡亦在國聯審議期間，表示反對退盟。但陸軍則一意孤行，等到「熱河作戰」，即向國聯挑戰。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抬頭，少壯軍人、右翼團體、外務省，政黨中的激進派大力鼓吹，結果陸相荒木貞夫、海相大角岑生、外相內田康哉等脫盟論者得勢，乃逐漸傾向於退出國聯之策（註一六四）。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經過激烈的辯論以後，因日本絕對反對接受李頓報告書中的解決方案，以及取消滿洲國的承認，遂付之表決。結果除日本反對，暹羅棄權之外其餘到會會員國四十二票，一致贊成，正式通過「報告書」（註一六五）。大會通過報告書後，日本代表團憤然退席。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正式退出國聯，此後日本軍國主義放棄國際協調主義，一意孤行。

四、結語

日本之侵略東北，乃是其大陸政策的一環，也是日俄戰爭以後積極企求的目標。九一八事變則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危機所產生軍國主義勢力，處心積慮發動的軍事侵略，同時也是露骨的帝國主義戰爭。

軍國主義勢力所以於此際發動事變，其主要原因乃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侵略性（後進帝國主義，因較缺乏資本與技術，取以軍事，政治的獨立方式爲其特色），而其直接的契機，則是由於世界大恐慌所引起，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上的危機，而當時的國際環境亦構成日本發動軍事行動最適切的條件。

一九二〇年代後期，日本國家主義思想極盛，這種思想由來已久，早自幕府末年，明治維新以後即已形成。「八紘一宇」的思想極爲普遍，由國家主義而國粹主義，再進而雄飛海外，成立世界霸業的國策，由於長久的歷史薰陶而深植民心，養成日本軍人的好戰精神，不僅有「佔領滿洲」的假想戰略，且有建立「超大國」，與西洋列強抗衡，以衛護中國的使命感。因而而在其認定日本國內外有利環境下，即毫不猶疑地採取軍事行動，以實現其軍國主義的美夢。

東北的資源及其一切雖得天獨厚，却不如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想像之甚，但爲了成霸業，強調在戰略上，經濟利益上，政治價值上的絕對重要性，而提出滿蒙「生命線」的口號，中國似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際遇，但軍國主義者之故意誇大渲染，亦可見其貪圖，霸佔之野心。

以同文同種爲標榜，強調文化關連性的「大亞洲主義」，原是爲了與中國共同對付西歐的一種意圖。日本的國家主義者——大川周明、北一輝、櫻會等人士大都主張要解放亞洲各民族，以免淪入西歐的支配，石原莞爾憧憬的未來世界真正大戰的模式，將是東西兩大文明的代表——日美的爭霸戰，正足反映此一想法。但當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時，日本所倡導的大亞洲主義乃完全變質，九一八事變之後，這種矛盾愈益顯著，甚至變本加厲，更發展爲「大東亞共榮圈」，大陸政策亦擴展爲整個東半球的侵略。

日本國內政局的刺激，也是此次事變不可忽略的動因。「滿洲問題」之引起日本軍國主義者極大關心，與其說是日本在滿權益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挑戰而面臨重大危機，不如說是日本爲了解決國內危機，而求諸滿洲。原田熊雄於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曾在貴族院發表演說：「如謂瀋陽事變係屬國際事件，則此判斷尚非精確。瀋陽事變乃三月事件之回波，瀋陽事件如見成功，日本軍人將以爲凡可得意於國外者，亦可成功於國內。」實爲頗中肯綮之論。蓋三月事件失敗後，「國外先行論」抬頭，少壯派軍人遂與關東軍裡應外合，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的決策過程中，最顯著的特色是對現實權威的反抗，蓋最後決定政策的，常是關東軍幕僚，或中央軍部中的少壯軍官。他們甚至不惜以「辭職」、「獨立」爲武器，以遂其左右政策之目的。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局的紛亂以及幾次政變，顯示日本政軍界「下剋上」風氣之盛，九一八事變的發動以及偽滿洲國的建立，正是此一風潮成功的例子。

日本之承認「滿洲國」以及退出國聯，表示日本對本身國力評價發生甚大變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實建立在中日與西歐三方面實力關係之上。明治時期的國家主義者，由於飽受西歐的衝擊、威脅，對列強懷有畏懼、崇拜的心理，因而一直採取所謂「協調外交」，但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後，却發生根本的變化。此後日本一改協調外交的根本方針，而採取「自主外交」。軍國主義日本已在國際上孤立，而其侵略擴張則更無止境。

關東軍原有佔領「滿蒙」的構想與計劃，其後與日本軍部（中央）、「滿洲青年聯盟」等妥協，改而建立「偽滿洲國」。經由「本庄、溥儀換文」及「日滿議定書」，確立由關東軍統治掌握偽滿洲國大權的特殊統治形態。

日本軍國主義之形成，有其思想上的背景與內外因素，而其形成之時機則以九一八為肇端，此後日本軍國主義一意孤行，肆無忌憚地向外擴張，顯露其軍國主義的本質。

關於中國方面，值得探討的，是所謂「不抵抗政策」問題，無論學生運動如何熱烈的展開，抵制日貨運動如何的推展，國民政府却抱定「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件時，中國之不抵抗，固由於客觀環境，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實際上是諳於知彼，而非「怯於對外」。張學良是不抵抗主義的實行者，但絕不是創始者，因而把一切責任全歸諸於張一人，似非持平之論。而馬占山等「東北義勇軍」的英勇奮戰，雖一時洗刷了「不抵抗」的恥辱，但仍無法挽狂瀾於既倒。

註 釋

- 註 一：丸山眞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一九七九年）頁二八五。
- 註 二：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八年）頁一六四—一六五。
- 註 三：蘇振申「石原莞爾的世界帝國構想——九一八事變的透視」（『中華學報』第六卷第一期）。
- 註 四：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之形成』（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八〇年）頁十一—十二。『日本之軍國主義』（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五三年）頁十。
- 註 五：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一九六六年）頁一九六—一九七。
- 註 六：James B. Crowley,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 ~ 1938*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1966) pp. 7—8。
- 註 七：大陸政策的目標是向中國大陸、西伯利亞擴展，謂之北進；以南洋各地為其擴張目標的海洋政策稱為南進政策。參照方秋華「日本大陸政策的南進政策」（載『日本評論』第十三卷第七期頁一七）。
- 註 八：「國體」（Kokutai）即國家之形象（「國風」Kuniburi）或性格（「國柄」Kunigara），含有倫理、價值觀、風俗習慣等之意。參照「現代史資料、國家主義運動」（東京、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九年）頁三一—六。Nobuya Bamba, *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 New L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 1924 ~ 1929* (Kyoto: Minerva Press, 1980) p. 8。

- 註九：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説』（東京、慶應通信、一九七三年）頁九六。
- 註一〇：『山縣有朋意見書』頁三〇八—三一四。
- 註一一：田中直吉『日露協商論』（植田捷雄編『近代日本外交史之研究』，東京、有斐閣，一九五六年，頁二九七—三六四。）
- 註一二：栗原健『對滿政策史之一面』（東京、原書房、一九六六年）頁一三九—一六三。
- 註一三：植田捷雄『東洋外交史』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四年）頁五六九。江口圭一『日本帝國主義史論』（東京、青木書店、一九八〇年）頁四。
- 註一四：江口圭一・小野信爾『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革命』（岩波講座『日本歷史，20、現代(8)』）頁十五—十六。
- 註一五：康特洛維奇著，廣島定吉譯『支那制霸戰と太平洋（下）』頁一五八。
- 註一六：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一九六六年）下，頁六二。
- 註一七：依井上清之界定『所謂軍部，並非國家機構的一個部門，諸如立法或行政部門。軍部實質上包括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以及陸海等兩省，獨立於政府、議會以及國民的管轄之外，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見『大正時期的政治與軍部』
- 註一八：江口圭一『郭松齡事件と日本帝國主義』（『人文學報』一七號）頁八六。
- 註一九：日本駐華公使館陸軍武官室『在支諜報武官會議記事』，引自江口、小野前引論文。
- 註二〇：字垣一成『字垣日記』頁二五、四二。
- 註二一：本庄繁『對支作戰は如何なる動機にて勃發するやの研究』，引自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5-1945. T. 645
- 註二二：幣原平和財團編『幣原喜重郎』（東京、一九五五年）頁二七六。
- 註二三：江口・小野，前引論文，頁一八。
- 註二四：執中『最近二年來日本政局の鳥瞰』（『東方雜誌』二十六卷十四號，民國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頁四九。）
- 註二五：江口・小野，前引論文。『日本外交文書並主要文書』下，頁九三—九四。
- 註二六：『大阪毎日新聞』（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二月二十五日）。
- 註二七：江口・小野，前引論文。
- 註二八：參謀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變出兵史』頁二〇—二一。朝日新聞社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六三年）1，滿州事變，頁一八八—二八九。
- 註二九：山浦貫一編『森恪』（東京、高山書院、一九四三年）頁五九九—六〇一。高倉徹一『田中義一傳記』（東京、田中義一傳記刊行會、一九六〇年）下卷，頁六三九。『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頁一〇—一〇二。

- 註 三〇：『昭和三年支那事變出兵史』頁八六。『太平洋戰爭への道』1，頁三〇一。
- 註 三一：『森恪』頁五九一六〇〇。江口・小野，前引論文，頁二九。
- 註 三二：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出動政史資料』，引自江口・小野，前引論文。
- 註 三三：山口一郎『中國と日本』（東京、潮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頁一五九。稻生典太郎『日本外交思想史論考，第二』（東京、小峯書店、一九六七年）頁三六〇—三六六。
- 註 三四：蔡智堪「我怎樣取得田中奏摺」；趙尺子「田中奏摺與蔡智堪」（『傳記文學』七卷四期）。樂炳南「北伐期間田中內閣對華之『積極』政策」（載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七輯頁三九五—三九六）。Hallett Abend, *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3) p. 162.
- 註 三五：稻生典太郎，前引書，頁三七九—三八二。『日本帝國主義史論』頁二九六—三〇五。衛藤瀨吉「東奉線遮斷問題之外交通程——田中外交及其背景」（『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頁二三一）。
- 註 三六：顧維鈞「參與國際聯合調查委員會中國代表處說帖」（文海出版社重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四八三）頁一四。
- 註 三七：Mamoru Shigemitsu, *Japan and Her Destin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58) p. 46.
- 註 三八：『日本帝國主義史論』頁三〇二。
- 註 三九：江口・小野，前引論文，頁三〇—三一。
- 註 四〇：『現代史資料 23，國家主義運動』(二)，頁三一六。
- 註 四一：Nebuya Bamba, *op. cit.*, pp. 25-26.
- 註 四二：『現代史資料 23，國家主義運動』(二)，頁二六一—五五。今井清一「天皇制與法西斯主義」（載歷史科學協議會編『日本法西斯主義論』，東京、校倉書房、一九七七年，頁一五九）。
- 註 四三：緒方貞子『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原書房，一九六六年）頁四五—四六。
- 註 四四：同上書，頁六〇—六一。『太平洋戰爭への道』1，頁三七九—三八一。
- 註 四五：『太平洋戰爭への道』2，頁一六七—一六八。
- 註 四六：『現代史資料 5，國家主義運動』(二)，頁三四。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東京、改造社、一九二三年）頁五。
- 註 四七：重光葵『昭和之動亂』（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五二年）上，頁十。
- 註 四八：緒方貞子，前引書，頁四八。
- 註 四九：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 1975) p. 345.

- 註 五〇：石原莞爾「滿蒙問題私見」(載「太平洋戰爭への道」別卷資料篇)頁九九—一〇〇。
- 註 五一：入江昭『日本之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六六年)頁一一一。Marius B. Jansen, Japanese Views of China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y and Mary C.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181-184.
- 註 五二：張維楨「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載「現代評論」七卷一百七十二期)頁一七。
- 註 五三：『日本の外交』頁一〇八。
- 註 五四：同上。
- 註 五五：張忠絳『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七年)頁三二八—三三六。劉彥『歐戰期間中日外交史』(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三年影印本)頁二六九—二七二。參照細谷干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東京、有斐閣、一九五五年) James W. Morley, 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 1918 (New York, 1957))
- 註 五六：James B. Crowley, op. cit., p. 192.
- 註 五七：Nobuya Bamba, op. cit., p. 309.
- 註 五八：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七七。
- 註 五九：石原莞爾「滿蒙問題私見」(一九三一年五月)、板垣征四郎「滿蒙問題ニ就テ」(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註 六〇：石原莞爾「戰爭史大觀」(載「太平洋戰爭への道」別卷)頁八四。
- 註 六一：中村隆英「戰前期日本經濟成長の分析」(東京、一九七一年)。宇佐美誠次郎「滿洲侵略」(載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現代)頁二一四—二一五。Charles P. Kind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1973) p. 280.
- 註 六二：『現代史資料』第七冊，頁一〇三。
- 註 六三：同上書，頁一〇五。
- 註 六四：入江昭『日本之外交』頁九七—九八。
- 註 六五：字垣一成『字垣一成日記(1)』(東京、一九六八年)頁五五—五五六。
- 註 六六：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8-1945. T. 645.
- 註 六七：Ibid
- 註 六八：『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頁一〇二。

- 註 六九：同註五九。
- 註 七〇：同上。
- 註 七一：『日本の外交』頁九八。
- 註 七二：『極東國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Ⅱ，六〇，田中隆吉證言。參照宇佐美誠次郎，前引論文。
- 註 七三：宇佐美誠次郎，前引論文，頁二一六。
- 註 七四：同上。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滿洲事變（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五三年）頁一一九。
- 註 七五：商租權係二十一條中第二號第二款規定，允許日人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可有土地之租借權。但北京政府則頒布「懲辦國賊條例」，「商租地畝須知」等，力加阻止。
- 註 七六：松岡洋右『動く滿蒙』（東京，先進社，一九三一年）頁二二四—二二五。『東亞全局の動搖』（東京，先進社，一九三一年）序文。
- 註 七七：『日本帝國主義史論』頁五四—五五。
- 註 七八：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六十七回帝國議會說明資料』，引自宇佐美，前引論文。
- 註 七九：野村浩一『滿洲事變直前の東三省問題』（載『日本外交史研究——中日關係の展開』頁七八）。Cavan McCormack, *Chang J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 Idea*, p. 92.
- 註 八〇：Cavan McCormack, *op. cit.*, pp. 93-99.
- 註 八一：野村浩一，前引論文，頁七八。植田捷雄『東洋外交史』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四年），頁五七四。
- 註 八二：『東方雜誌』卷二十四，第十九期，頁一三〇，第廿一期，頁一三〇。
- 註 八三：Cavan McCormack, *op. cit.*, p. 240.
- 註 八四：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五八七。『太平洋戰爭への道』1，頁二九五—二九六。
- 註 八五：『太平洋戰爭への道』1，頁三〇三—三〇六。
- 註 八六：白井勝美「張作霖爆死の真相」（載『別冊，知性、秘められた昭和史』頁三二—三三。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 Vol. II pp. 229-231.
- 註 八七：『近代中國史綱』頁五九九。『太平洋戰爭への道』1，頁三〇八—三〇九。『田中義一傳記』頁九五七。
- 註 八八：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説』頁一五七—一五八。

- 註 八九：「日本帝國主義史論」頁五八。
- 註 九〇：同註一五。
- 註 九一：Yanagi, *Japan since Perry*, pp. 421-22. 「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七〇。
- 註 九二：同上書，頁二七一。板垣「滿蒙問題二就テ」。
- 註 九三：宇佐美，前引論文，頁二二〇。
- 註 九四：H.L. Stimson, *Far Eastern Crisis*, pp. 5-6.
- 註 九五：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N.Y. 1973) p. 80.
- 註 九六：W.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Oxford, 1971) p. 210.
- 註 九七：Christopher Thorne, *op. cit.*, Chap. I.
- 註 九八：猪口孝「外交態様の比較研究」(東京、巖南堂書店、一九七八年)頁二三〇。Louis, *op. cit.*, p. 28.
- 註 九九：Christopher Thorne, *op. cit.*, p. 392.
- 註 一〇〇：Ibid, p. 123.
- 註 一〇一：中山治一「日露戰爭以後」(大阪、創元社、一九五七年)頁四。
- 註 一〇二：矢內原忠雄「滿洲新國家論」(載「矢內原忠雄全集」，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頁六一。
- 註 一〇三：猪口孝：前引書，頁二二四。
- 註 一〇四：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九四—九五。
- 註 一〇五：「極東新秩序の模索」頁二七〇。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九六。
- 註 一〇六：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九五—九七。
- 註 一〇七：片倉衷談話記錄，引自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九七。
- 註 一〇八：稻葉正夫「滿洲事變」(昭和戰爭史講座，載「國防雜誌」第六號，一九六二年)，「九一八事變史述」頁四八。
- 註 一〇九：「太平洋戰爭への道」1，頁三七七、三八二—三八三。「九一八事變史述」頁四八—四九。
- 註 一一〇：「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七六—七七。
- 註 一一一：同上書，頁七八—八四。
- 註 一二二：同上書，頁七二。

註一一三：同上書，頁七二—七五。「日本外交史概說」頁一六三。

註一一四：萬寶山事件係一九三〇年五月，中韓兩國農民爲爭水道而發生爭執，因日本利用此一事件作爲解決滿洲問題的手段，而擴大爲朝鮮境內的反華暴動。參照「太平洋戰爭史」¹，頁一一七—一一八。

註一一五：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密赴洮南偵察，爲中國駐軍所捕殺。日本向中國提出嚴重交涉，成爲中日間爭執的事件。

註一一六：『極東新秩序の模索』頁二七二。「九一八事變史述」頁六一。

註一一七：『原田日記』第二卷，頁五五，「木戶幸一日記」（昭和六年九月一〇日）。

註一一八：『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一〇〇。

註一一九：『日本外交史概說』頁一六六。

註一二〇：『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三。

註一二一：『日本外交史概說』頁三。
註一二二：『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四—二七。
云，參照『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四—二七。

註一二三：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北，綜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頁八四。「近代中國史綱」頁六二七。

註一二四：W. W. Willoughby,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John Hopkins Univ. Press, 1935) pp. 33-46.

註一二五：『原田日記』第二卷，頁七〇。「東洋外交史」下，頁五八二。

註一二六：同上書，頁六五。「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一一一。

註一二七：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一五三—一六八。

註一二八：『太平洋戰爭への道』2，頁五二、七七、九九—一一〇。

註一二九：『近代中國史綱』頁六三三。「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七六。

註一三〇：米次秀夫「對日ポイコットと民族ブルジョア階級」（『中國近代化と日本』）頁一一九。

註一三一：米次秀夫，前引論文，頁一二三。

註一三二：上海日本商工會議所編「滿洲事變後の對日經濟絕交運動」（一九三一年）頁二六—二七。

註一三三：同註一三一。

註一三四：『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 註一三五：「平西報」(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一六。
- 註一三六：Warren Isreal,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Harvard Univ. Phd dissertation, 1963.) p. 14, 16. pp. 60-61, p. 80.
- 註一三七：『太平洋戰爭への道』2, 頁二七九。
- 註一三八：『九一八事變史述』2, 頁一一八。
- 註一三九：角田順『石原莞爾資料』頁四二。「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二二八。
- 註一四〇：石射猪太郎『外交官の一生』(東京、讀賣新聞社、一九五〇年)頁一八七。
- 註一四一：『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二八一—三〇、二〇三。「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 頁一五〇。
- 註一四二：「片倉日誌」(昭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七日)。「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二〇八。
- 註一四三：『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 頁一八六。緒方貞子, 前引書, 頁一七四—一七五。「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 頁一七四。
- 註一四四：薄儀東京裁判出庭證言, 『東京裁判記録』頁三九五四、四一二四。「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 頁一七五。
- 註一四五：同註一四一。
- 註一四六：「片倉日誌」(昭和七年二月二日、五日、八日、九日、十一日)。
- 註一四七：『全史關東軍』頁一六九。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2. pp. 456-457.
- 註一四八：緒方貞子, 前引書, 頁二一九—二二〇。
- 註一四九：『全史關東軍』頁一八四—一八六。
- 註一五〇：『日本外交史概説』頁一七一—一七二。「全史關東軍」頁一七二。「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六三。
- 註一五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 頁二一六。緒方貞子, 前引書, 頁二二〇。
- 註一五二：緒方貞子, 前引書, 頁二二〇。
- 註一五三：『全史關東軍』頁一八〇。
- 註一五四：同註一四九。「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七一、二七四—二七五。
- 註一五五：『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 頁二一五。「全史關東軍」頁一九四。緒方貞子, 前引書, 頁二七〇。
- 註一五六：『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二六六、二七一。「全史關東軍」頁一九三。
- 註一五七：『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 頁三五〇。Sara R. Smith,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1932. Trage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8-29.

註一五八：Elting E. Morrison, Turmoil and Tradition : A Stud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 Stimson. pp. 374.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頁三五三—三五五。

註一五九：『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頁一九四。『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頁三六四。『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三三〇。

註一六〇：Sara R. Smith,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1932, Trage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3, p. 610.

註一六一：『日本外交史概説』頁一七一。

註一六二：『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頁一一六一—一三八。『太平洋戦争史』1、頁一四〇—一四三。

註一六三：國際聯盟秘書處，日本公定譯本『國際聯盟日支紛争調査委員會報告書』頁二八〇—二八二。The Report of the Com-

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1932, p. 142, 198. pp. 266-

284.

註一六四：『日本外交史概説』頁一七五。緒方貞子，前引書二八五—二八七。

註一六五：緒方貞子，前引書，頁二八五。『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頁三八二。